

译介之旅

从教近30年,为研究生开设的《文学翻译》课上被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文学翻译需要理论吗?对于熟读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同学来说,理论指导实践似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想不到答案竟是“不需要”。

这一答案当然与文学翻译自身的特点有关。与科技、法律以及医药类等非文学翻译不同,文学翻译更多强调语言的模糊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与所谓科学性背道而驰。正如翻译家孙艺风指出的那样:无论从语境、修辞,还是从语体风格等方面来考查,所有翻译类型中问题最多、最具挑战的当属文学翻译无疑。海明威关于文学创作的冰山理论其实完全可以应用于文学翻译:文本字面上的意义远不及言下之意来得丰富而深刻,而貌似忠实的“词对词”翻译其实最不忠实,因为文学文本的翻译要求译者不仅从文本指示层面,更要从文本意味层面去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翻译既是“翻译”,又是“创造”,是二者结合的“译创”。落实到具体的翻译方法,则增译、减译、归化、异化等皆为其题中应有之义。惟其如此,译者方能如英国大诗人德莱顿所言,“完全沉浸在作品中,完全理解作者的天才和敏锐,理解主题的性质,以及作者在表达主题时所采用的艺术手法”,从而实现艺术的再创造。

与之相反,具体到翻译理论,尤其是来自异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翻译理论,则另当别论。译界前辈王宗炎在一篇文章中曾说,异域的理论往往对指导翻译教学(以及翻译实践)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这里首先需要对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与来自异域的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加以区别。传统翻译理论往往是实践(译经)的产物,如三国时支谦的“文质”论,晋代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鸠摩罗什的“得大意”与“文体”说,隋代彦琼的“八备十条”,唐玄奘的“五不翻”等,言简意赅,极为警策。至于近世,无论徐光启的“会通”说,马建忠的“善译”说,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说,还是钱钟书的“化境”论,大抵要言不烦,都是以极其简明扼要的方式对翻译知识系统化的表述和解说,即令初学者闻之亦当欣然会意。

西方古代翻译理论与思想与中国极为相似,如西塞罗主张意译“风格”;圣·哲罗姆强调“意义的转换”;德莱顿在直译、意译之外,还提倡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译”;施莱尔马赫提出翻译是“阐释”;其他如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与严复的主张如出一辙,正说明东西方传统翻译思想的高度契合。然而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却渐渐偏离了文学、语言学而进入到社会学以及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各家学说的众声喧哗,各领风骚,如勒弗菲尔“操控”论,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观,伊文-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鲁宾逊“意识形态身体学”等,而其中尤以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以及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影响最大——其对翻译知识的明言化、条理化、图表化诉求显得异常明显。但问题只在于,正如美国批评家布鲁姆所言,上述“文化转向”理论家皆可归入“憎恨学派”:他们强调了文学翻译的历史、文化及社

作家原声

对航空公司而言,要和其他交通工具竞争,那比的就是速度。正如《夜航》中令人钦佩的领导者里维埃解释的那样:“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我们白天对比铁路和轮船所取得的优势,在夜里又输回去了。”这项夜间服务,开始饱受非议,后来被接受了,虽然在最初一系列冒险试验后变得切实可行,但就在《夜航》写作之时,还是充满未知之数;航空飞行这一路本身就充满风险和意外,如今还要加上黑夜的神秘诡谲。尽管冒险仍然很大,但我还得赶紧说,它们会一天天减少,每一次新的航行都会让下一次航行变得更加容易、更加安全。但是,航空事业就像拓荒一样,也有一个英雄的创初期,《夜航》为我们描绘了其中一位航空事业开拓者的悲歌,自然就有了一种史诗般的调子。

我喜欢圣艾克絮佩里的第一本书,但更喜欢这一本。在《南线邮航》中,飞行员的回忆细腻准确,扣人心弦,交织着一段情感故事,拉近了主人公和我们的距离。那么柔情似水,啊!让我们感到他的真实,人性的脆弱。《夜航》的主人公,显然不是不近人情,而是升华到了超人的精神境界。我认为,这部惊心动魄的作品最吸引我的是人的高尚情操。人的软弱、自暴自弃、衰败,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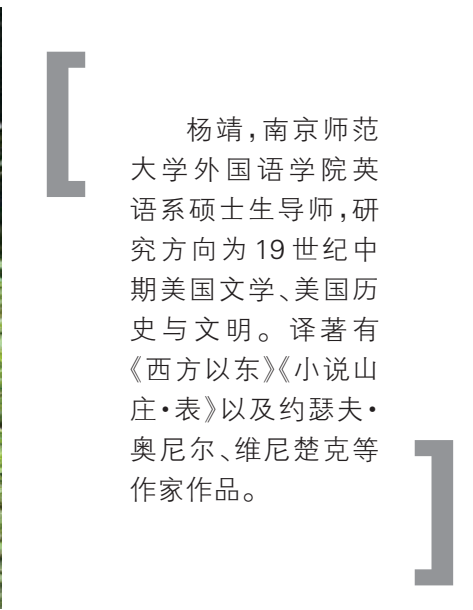
杨靖,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19世纪中期美国文学、美国历史与文明。译著有《西方以东》《小说山庄·表》以及约瑟夫·奥尼尔、维尼楚克等作家作品。

会背景等外部研究,却扼杀了文学自身的美感和想象力——这一类并非来源于翻译实践的理论显然无法指导实践:二者的关系正如鸟类学家之于鸟。

借助于英国物理学家波兰尼的意会知识理论,可以对上述问题有更为真切的认识:波兰尼将人类知识分为意会知识和明言知识,从意会知识到明言知识构成一个连续体。意会知识的特点在于它的无意识性、个体性以及特定语境性,即其作用的发挥依靠特定的情境与氛围——它只能来源于长期的经验与体验,而且很难与他人沟通和分享。而意会知识与明言知识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意会知识是自足的,而明言知识则必须依赖于被意会地理解和运用。”一语道出意会知识的优先性。就翻译而言,翻译实践中学习者获得的正是在具体行动中获取的知识,是意会翻译知识;而翻译理论旨在将翻译实践中获得的知识条理化、公式化或者图表化,形成明言翻译知识。很显然,翻译意会知识难于明言知识,因此,大多数翻译家对翻译的深刻体味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这并不是说翻译意会知识具有神秘性:它只是受到人类理性认识能力的局限。

波兰尼意会知识的优先性原理还体现在,意会知识的前提不一样,即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来源不同时,由意会知识提升出来的明言知识也是不同的。这一点对于我国当下的翻译研究极具参考价值,因为西方的翻译明言知识是在西方意会翻译知识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而西方意会翻译知识的来源主要是印欧语之间的转换活动,用这种翻译明言知识来指导中国学生学习和研究翻译,既忽视了该知识的来源,也违背了意会知识优先性原理,显然行不通。如翻译家出身的纽马克本人曾坦承,他所从事的翻译教学主要在印欧语之间进行,难度相对较小。而在英汉语言的翻译及教学过程中,由于两种语言分属不同语系,差异巨大,倘若一定要以交际翻译理论来做指针,则无异于削足适履。

意会知识的优先性原理对于正确认识翻



译实践与翻译理论之间的关系也极具意义。众所周知,个体在实践中得到的全部知识里总有一部分或许多是无法言传的,因为它们同认识主体的身心融为一体、不可分离,此即为波兰尼所谓的“涉身性”。语言是人类进行沟通的主要工具,然而“言有尽而意无穷”,事实上,“一种无法详细言传的技艺不能通过规定流传下去,因为这样的规定并不存在。它只能通过师傅徒弟这样的示范方式流传下

译文

我花了三十年时间,在失去所有亲人后,终于来到贝尔格莱德。此刻我徘徊在表妹的公寓门前,一手捧着鲜花,一手拿着巧克力,心里默念着想要问她的一个简单问题。就在刚才,一个塞族的出租车司机哼了我一口;我借机擦掉衣袖上的唾痕。我数到十一。

薇拉,我在脑海里又重复一遍,你愿意嫁给我吗?

第一次遇见薇拉是1970年夏天,那年我六岁。那时候我们全家住在保加斯科·塞罗村,她们家住在一河之隔的塞伯斯科村。很久以前,这两个村子原本是一个——叫做斯塔罗·塞罗村;可是大战后保加利亚人丢了那片土地,后来就归了塞族人。将村子分成两半的那一条河形成了天然疆界:河东属于保加利亚,河西则归塞尔维亚。

沿河两岸的村民因此痛苦不堪;我们的入想方设法获得两国政府批准:每隔四年可以举办一次大团圆的聚会。表面上看,这是堂皇正大地宣示:我们不能背宗忘本。而事实上,这不过给大伙儿吃烤肉喝莱齐亚烈酒找个借口。直到一个个吃得倒胃,喝得不省人事,才肯罢休。到了1970年夏天,聚会的地

点轮到塞伯斯科,也就是说,我们先得渡河。

我们这样过河:

伴随着突突的马达声和冒出的阵阵黑烟,米哈拉齐驾着船来到河边。船很酷。事实上它也不能叫船,只不过在木筏上装了个马达。他从旧的“莫斯科人”轿车上拆下座椅(那牌子的俄国轿车引擎像坦克),固定在木筏的底板上,还在上面铺上山羊皮的软垫。羊毛掉光了,只剩下黑一块白一块的斑点,还有棕色的皮。他端坐在座椅上,洋洋自得,简直酷毙了。嘴上还叼着个紫檀木的烟嘴;长长的一头白发迎风飘舞,像一面旗帜。

我们的人在河岸边,等着。我爹一手牵一头白羊,另只手扶着肩上一坛莱齐亚葡萄酒。他盯着船看,两眼放光,嘴唇发干。他旁边是一只装满奶酪的木桶。我叔坐在木桶上数钱。

“他们要是肯用德国马克来买就好了”,他说。

“他们一直都是这样,”我爹告诉他。

——杨靖译米罗斯拉夫·潘科夫《西方以东》

《夜航》:要把勇敢和爱一样藏在心里

□[法]安德烈·纪德 黄 荭/译



们已经看得太多,今天的文学太擅长揭露它们了;但靠坚强的意志超越自我,这恰恰是特别需要有人向我们展示的。

在我看来,比飞行员的形象更令人惊叹的是他的上司里维埃。他本人不行动:他促使别人行动,把他的道德标准灌输给飞行员,要求他们尽力而为,敦促他们建功立业。他铁面无私的决定容不得软弱,再小的疏漏都要受到惩罚。他的严厉的作品最吸引我的是人的高尚情操。但他的态度是针对工作中的瑕疵而

完全不是针对人的,里维埃的用意是要锤炼人。通过这样的描绘,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满满的钦佩之情。我尤其感激作者阐明了这个充满悖论的真理,对我而言具有重大的心理价值:人的幸福不在于自由,而在于承担责任。小说《夜航》的每一个人都是满腔热忱、全心全意奉献给该做的事,投入到这项充满危险的任务中,只有任务完成了他们才会找到幸福的休憩。人们还可以看到,里维埃绝不是铁石心肠的人(再没有比他接待失踪者妻子的那段描述更令人动容的了),他给他手下的飞行员下达命令时所需要的勇气绝不比飞行员执行这些命令时所要付出的勇气少。

“想让别人喜欢自己,只要同情别人就行。我从不同情,就算有也藏在心里……有时,我也惊讶于自己的能力。”他还说:“关爱听命于您手下。但不要告诉他们。”

这也因为支配里维埃的是责任感,“隐约感觉到一种比爱更伟大的责任”。但愿人不要去追求个人自身的目的,而去服从并献身于主宰和依赖他的事业。我喜欢在这里再看到这份“隐约的责任感”,让我的普罗米修斯不合常理地说出:“我不爱人,我爱的是人内心的挣扎。”这是一切英雄主义的源泉:“我们在行

动时,”里维埃想,“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比人的生命更宝贵……但它是什么呢?”他又说:“或许还有其它东西需要拯救,一些更持久的东西;或许里维埃是为了拯救人更持久的品质而工作。”对此我们毋庸置疑。

化学家们让我们预感到未来战争的恐怖,男子汉气概或许再无用武之地,英雄主义的传统便会在军队里消亡,在这种时候,难道不是在航空事业中我们能看到勇气得到最令人赞叹、最有益的施展吗?原本可能被视为鲁莽的举动,若是出于服务的需求就另当别论了。飞行员不断地拿自己的生命冒险,自然有权嘲笑我们平时对“勇气”的看法。请圣艾克絮佩里允许我引用他的一封信旧信;这封信要回溯到他飞越毛里塔尼亚、负责卡萨布兰卡-达喀尔航线的那个时期: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这几个月工作太多了;寻找失踪的同志,抢修掉在抵抗区的飞机,给达喀尔送了几趟邮包。

我刚立了一个小功:为了救一架飞机,我同十一个摩尔人和一名机械师度过了两天两夜。状况频出、危机四伏。我是第一次听到子弹从我头顶呼啸而过。我终于知道自己在这种环境下是什么样子了:我比摩尔人镇定得多。而且我也明

白了以前始终让我感到惊讶的事,就是柏拉图(或是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要将勇气排在各种德行之后。这勇气也不是什么美好的情操,只不过是一点儿狂热、一点儿虚荣、十分顽固以及一种庸俗的体育乐趣合成的罢了。特别是与勇气无关的体力上的完备。双臂交叉放在敞开的衬衣前,畅快地呼吸,是很惬意。这事要是发生在夜里,就会掺杂了一种做了天大蠢事的感觉。我再也不会去欣赏一个仅仅只是勇敢的人。

我可以引用坎东(尽管我一直不太同意他的观点)书中的一句格言来作为我引的这段话的题铭:“要把勇敢和爱一样藏在心里”;或者更精彩的是:“勇士不想让人知道他们的事迹,就像老实人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的施舍。他们不露痕迹或婉言推说不是。”

圣艾克絮佩里在书中所讲述的,都是他“知根知底”的。他常常身陷险境,他的亲身经历赋予了他的书一种真实、不可模仿的韵味。我们有大量战争或幻想冒险小说,有时候作者编得头头是道,但真正的冒险家或战士读了只会觉得好笑。这篇故事除了我非常欣赏的文学价值以外,还有一种史料的价值,这两种品质那么出人意料地融为一体,赋予《夜航》非同凡响的重要地位。

西山晨语

一个语种的文学是由使用该语种的作家们创作出来的,而一个语种文学的历史却有可能用其他语种来加以描述;一个民族的文学是本民族文学智慧的结晶,而关于任何一种民族文学的阐释却是向世界上所有文学史家开放的。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的文学是民族的,关于这个国家文学历史的书写却可以是世界的。

中国文学有着绵延两千三年的灿烂历史,但世界上第一部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却出自一位俄国人之手,这便是1880年在彼得堡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其作者是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主任瓦西里(本名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1818—1900,瓦西里是他为自己取的汉语名字),此书已由南开大学教授阎国栋译出,于数年前由彼得堡大学孔子学院推出。而在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被认为是系翟理斯所著,郑振铎在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写道:“翟理斯(A. Giles)的英文本《中国文学史》,自称为第一部的中国文学史,其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在公元1901年。中国人自著之中国文学史,最早的一部,似为出版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林传甲所著的一种。”五四之后,为中国文学治史作传蔚然成风,各类文学史著如雨后春笋,至今恐有数千部之多,但即使如此,外国人所作或用外语写成的中国文学史仍不时对我们的文学史学产生强大冲击,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学界掀起的波涛,其对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锺书等人的“发掘”以及对鲁迅等人的冷淡,完全颠覆了国人先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最近几年,孙康宜和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又相继被译成中文,这表明“域外的”中国文学史依旧具有阅读价值和学术意义。

作为世界文学中重要的语种文学之一,俄国文学的历史在俄国境内外也都得到了持续不断的书写。俄国本国最早的文文学史研究始于18世纪中期,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的《论俄国古代、中期和最新的诗歌创作》(1755)被视为第一部俄国文学史著作。在此之后,各种各样的俄国文学史著在250多年间不断涌现,汗牛充栋。而俄国文学史的境外书写则始于19世纪中后期,这在时间上也与俄国文学的强势崛起相吻合,较早的著述有法国作家沃盖的《俄国小说》(1886)、西班牙作家巴赞的《俄国的革命与小说》(1887)和德国柏林大学教授鲁克纳的《俄国文学史》(1908)等。近百余年间,西方出版了大量俄国文学史著,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有米尔斯基的两卷本《俄国文学史》(1926—1927)、斯洛尼姆斯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史》(1964)、纳博科夫的《俄国文学讲稿》(1981)、法国斯拉夫学者乔治·尼瓦主编的六卷本法文版《俄国文学史》(1987—2005)和美国学者英瑟主编的《剑桥俄国文学史》(2008)等,这里提及的前三部著作均已译成汉语。

中国的俄国文学研究者大多能阅读俄文和英文版的俄国文学史著,但对其他语种的同类著作却知之甚少,其他国家的俄国文学研究者或许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为打破世界各国俄国文学史家之间的隔膜,由笔者首倡于2015年末在北京举办了题为“俄国文学史的多语种书写”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30余位俄国文学史家汇聚一堂,就世界各主要语种的俄国文学史书写的历史和现状、类型和风格等展开讨论,作为此次会议之学术成果的论文集《俄国文学史的多语种书写》也已由笔者编成,于近期面世(东方出版社2017年版)。这部文集的作者中不乏国外著名俄国文学史研究者,如欧洲科学院院士尼瓦、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所长巴格诺、俄国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波隆斯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利波维茨基等。文集不仅初步描绘出一幅俄国文学史书写的世界图景,同时也将世界各国的俄国文学史家团结在了一起。

因这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和会议文集的顺利出版而备受鼓舞,几位同行决定联袂编纂一部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俄国文学在19、20世纪之交进入中国,在此之后短短二三十年间便出现了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俄国文学史,郑振铎的《俄国文学史略》(1924)、瞿秋白、蒋光慈的《俄罗斯文学》(1927)等构成了中国的俄国文学史研究的第一阶段。上世纪50年代,俄苏文学在中国广为流行,但让人颇感意外的是,在当时中国却鲜有关于俄苏文学历史的描述,占据显赫位置的文学史教科书似乎就是两部翻译过来的著作,即布罗茨基主编的三卷《俄国文学史》(蒋路、孙玮、刘辽逸译)和季莫菲耶夫主编的两卷本《苏联文学史》(叶水夫译)。直到20世纪80年代,由中国学者编纂的俄国文学史著才陆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曹清华主编的三卷本《俄苏文学史》和叶水夫主编的三卷本《苏联文学史》。此次编纂《俄国文学通史》,应该算中国的俄国文学史研究之中的第四个阶段。本课题组成员均为恢复高考后步入大学的同一代学者,如今正处于人文学者治学的黄金时段,且大多具有俄国文学史著的编纂或翻译经验,先后出版了数十部俄国文学史著或论著,如刘亚丁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1989)、王志耕的《俄国文学与中国》(1991)、郭体武的《俄罗斯文学史》(2008)、林精华的《外国文学史》(2009)、刘文飞的《插图本俄国文学史》(2010)和汪介之的《俄罗斯现代文学史》(2013)等。我们拟以《俄国文学通史》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此书如能顺利立项、撰写和出版,将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篇幅最大的一部俄国文学史著。

无论是中国文学史的外国书写,还是俄国文学史的中国书写,都在说明,任何一种文学的历史均不仅仅是该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其在世界范围内被接受和被阐释的历史。被用其他语种书写出来的文学史,不一定就具有旁观者清的劣势,但也未必只是具有异域情调的奇谈怪论,或是唱对台戏的心态和另立山头的企图之结果。对文学史的阐释应该是多元的、多义的,来自不用视角、不同文化背景的解读,往往能够丰富和深化我们关于某一种文学的理解和认识。

文学史的多语种书写

□刘文飞